

兰州大学出版社

GUOZAIHONGYANGYAXIYADEWAIJIAO

十四—十九世纪中国在 中亚细亚的外交

[哈]克拉拉·哈菲佐娃 著

杨恕 王尚达 译

十四—十九世纪中国在 中央亚细亚的外交

[哈] 克拉拉·哈菲佐娃 著

杨 恕 王尚达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四~十九世纪中国在中央亚细亚的外交/[哈]沙
伊苏尔坦诺夫娜著;杨恕,王尚达译,一兰州:兰州大
学出版社,2003

ISBN 7-311-02118-9

I.十... II.①沙... ②杨... ③王... III.中外关
系—国际关系史—中亚—研究—14世纪~19世纪
IV.D829.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实(2003)第 004908 号

十四—十九世纪中国在中央亚细亚的外交

[哈]克拉拉·哈菲佐娃 著

杨 恕 王尚达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奥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23 千字

印数:1~1000 册

ISBN7-311-02118-9

定价:18.00 元

译者序

本书作者是哈萨克斯坦汉学家克拉拉·哈菲佐娃·沙伊苏尔坦诺夫娜教授。她毕业于塔什干大学东方学系，后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获得副博士学位。苏联解体后又在东方研究所获博士学位。她先后工作于哈萨克阿里·法拉比民族大学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现在是哈萨克斯坦凯纳尔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系教授、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中亚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和冲突的地区。中亚和中国的交流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丝绸之路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是联系它们的纽带。对于中国和中亚的关系，各种文献都有大量的记载，不少学者对其方方面面做了研究，但对中亚和中国在外交领域的关系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却很少。据我们了解，外国学者大量依据中文文献对中国和中亚的外交进行研究的专著，本书可能是唯一的。

对于本书翻译中的一些问题，译者作如下的说明：

1、在俄文中，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和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特别是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的含义又有较大的变化，但译成中文时一般都译成中亚。在本书中，这两个词组在同时使用，显然都译成中亚是不妥的，因此，我们把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译成中央亚细亚，而把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译成中亚。这也是翻译中亚史俄文文献时的一般做法。简单地说，中央亚细亚大致包括了现在的中亚五国、阿富汗、伊朗北部、蒙古西部及西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新疆，而中亚则包括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中亚四国，主要是以布哈拉—撒马尔罕—奥什一线为中心的两河流域地区。

2、本书大量引用了中文文献，凡可查到的，我们一律以中文原文作为译文，而未查出原文的，则另行译出。

3、中亚古人地名地的翻译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一名多译是常见的事，我们尽量采用较通用的译名。对于不常见的名称则采用最接近于俄文的音译，这可能造成与原非俄文名称较大的差异。

4、对于原文的错误，凡发现的，用简单加注的方式指出，未做进一步解释。

14~19世纪大致是我国的明朝和清朝，在此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各国及各国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中外学者有争论的地方不少，如中亚与中国中原王朝的关系，中亚与新疆的关系，明朝及清朝前期新疆地区和中原王朝的关系等等，这里就不一一指出了。我们翻译本书，并不表示对于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同意作者的观点，只是希望读者对中亚及相关问题有更多、更全面的了解。克拉拉教授曾告诉译者：本书开始写作时中苏关系尚不正常，书中观点自然带有那时的痕迹，但这是历史，不便改动了。我们仅对其中个别字句做了删改。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本书，我们把魏良弢先生的文章《另一种角度的观察与诠释》（原载《中亚学刊》第5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附在《译者序》之后，并对魏先生表示谢意。

感谢克拉拉教授把本书的中文版权授权给我们，一些翻译中的问题，我们也曾直接与克拉拉教授讨论。相信本书的出版会有助于中国和中亚学者之间的进一步交流，有助于中国和中亚关系的研究。

兰大历史系赵辉杰先生及原历史系研究生侯艾君等也参与了部分翻译工作，于此表示感谢。

译者

2002年8月

另一种角度的观察与诠释

——评介哈菲佐娃《十四—十九世纪中国在中亚的外交》

魏良弢

—

我以极大的兴趣读完了哈菲佐娃教授的新著《十四—十九世纪中国在中亚的外交》。（К. Ш. Хафизова: Кита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XIV—XIX вв.) Алматы. 1995.) 这是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于1995年在阿拉木图公开出版。哈菲佐娃是一位中年学者，70年代即崭露头角，发表过一系列研究中国外交活动的论文，曾任哈萨克斯坦大学东方学系教授，中国语言文学教研室主任，现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直辖的战略研究所主导研究员。这是在苏联解体、中亚诸国独立之后，一位哈萨克本民族的专家写成的专著，加上她的学术地位和工作性质，非常值得认真一读。

下面将这部专著的目录转译于下（略——译者），然后作些评介。

二

这部专著是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提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反映了哈萨克斯坦乃至独联体诸国对这一课题研究的当今水平。这首先表现在作者对史料的重视和广泛收集与对研究文献的熟悉和充分利用。其《导论》专门对史料和研究文献做了阐述，长达31页，占全书篇幅的九分之一。

正如作者所说，他们这一代学者，在苏维埃时代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具有扎实的东方学基础知识，她提出的学位论文，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学的基础上，远非一般使命性很强的论著可比。她的专著充分利用了汉文史料“实录”、“断代史”、“方略”、“方志”（“图志”），礼部、四夷馆、理藩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原始材料和它们编写的材料以及私人关于西域的记述。作者对每类材料的各项文本都一一做了具体的介绍，包括作者经历、成书过程、史料价值、流通情况，评述其优点，指出其不足。作者同时对俄国及中亚诸国的历史档案也做了介绍，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优势，在使用过程中把这些外交文件的几种不同语言的文本（俄、汉或突厥诸语）进行对照，发现了不少问题，加深了人们对明、清两朝在中亚外交政策的认识和理解。

作为一部博士学位论文，作者对其前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有着深入的了解和切实的把握，使自己的专著在前人已达到的前沿上展开新的探索和研究。作者不仅注意到了俄国和苏联时代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而且也注意到了国外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在本世纪70~80年代及其以后所推出的重要论著，并在自己的论述中尊重和采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或提出不同的见解，均详注引用文献的版本、页码。这也反映了作者良好的学术道德和规范的

学术操作。

三

上面已讲过作者的学养和民族出身以及这部专著的成书时代，这些必将给作者以另一种视角，审视历史已有的某些“结论”，提出自己的诠释。它们既不同于前苏联学界的“结论”，也有别于西方学者的“结论”，同时也不同于中国学者对本国古代外交的“主位观察”。由于作者用另一种视角，也扩大了视野，增加了这一课题研究的新内容。

1. 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华夷之辨”，史家“不惜笔墨”地对异族，特别是对游牧民族进行“否定的描述”，这造成了民族心理上的障碍。对异族的轻蔑、嫌恶，直接影响到中国政府（包括明朝）在中亚的外交。她说，但是清朝的政策不同于明朝，对其邻国表现出好感和善意。作者一些颇有情感的表述，对于我们深入探讨“清朝在中亚的成功”很有启迪，除去其他因素外，在民族政治学上对异族公正、善意的诠释，彼此沟通，相互尊重文化习俗，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2. 作者指出，中国“西域”政策的实质是“附庸制”，自汉朝就奠定了这一原则。中国皇帝认为，普天之下都是自己的臣属、附庸，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封建外交制度——“贡贡”、“爵封官号”、“入质”、“附庸”等具体可操作的制度，其实质都是保证外交不平等原则的实现。然而中国的外交对手并不理会这些具体制度的实质，他们追求的是实惠——经济利益和政治支持。作者指出，中国王朝非常要面子，生怕使臣伤了皇帝的尊严，不许外国使臣晋见皇帝时面呈国书，而是必须事先送交礼部或理藩院审查、翻译，把本来平等往来的国书改变成了附庸对宗

主的奉章，把所有外国使臣的到来一律称为“朝贡”。甚至外国使臣在不明情况下就被中国王朝封为“侍卫”，他被领到宫门前，站在那里等皇帝接见，而在汉文史料中就被写成了“守卫”皇宫。有的国君或使臣也自愿地接受中国的爵封官号，但是为在与中国的贸易（“贡资”）中获得更多的实惠，或更容易完成外交使命，或作为政治外援借以对付自己的政敌或敌国，根据中亚诸国当时对政治学的理解，这种接受中国的封号绝不等于承认中国为宗主而把自己降为附庸。这点，中国学者已开始注意到，应更深入广泛地阅读中亚的历史文献，领悟其政治学说、思想情感，更为准确地论述历史上各国之间的关系。

3. 作者对外交礼仪给予了特别的注意，这有别一般外交史论著。她利用外交档案材料和其他史料，详细地引述了中亚国家接见外国使臣的具体操作过程。俄国使臣强烈要求准噶尔汗站起来接受国书，但汗坚持不肯。俄国使臣只好让步，在汗已酒醉的借口下，坐着接受了国书。中国使臣到了帖木儿的宫廷，同样也遵守当地的一切规定。通过一系列典型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中亚各国的君主同样也是“唯我独尊”，外国使臣为了完成使命，也只好以臣属身份进见，甚至气势汹汹的俄国使臣，也不得不让步。正如作者所说，无论中国、俄国、还是中亚各国，14～19世纪在中亚实行的都是封建外交礼仪，而西方资本主义的外交礼仪还未引入。

4. 关于中国在中亚外交活动中使用的语言，作者用专门一节做了考察。她根据可靠的史料确定，明朝基本上是用蒙古语作为在中亚外交活动的语言，清朝初年也是用蒙古语，当俄国势力在东方加强后间或用塔塔尔语，偶尔也用察合台语；在准噶尔汗国灭亡，天山南北统一后，维吾尔语成为清朝在中亚外交活动的基本语言。清朝对中亚的正式外交文件有两种、三种或四种文

本，它们分别用满文、汉文、蒙文或一种突厥语言（经常是用采用阿拉伯字母的维吾尔语）写成。作者认为，语言的被采用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民族在中亚影响的消长。

5. 使臣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到外交的成败。作者对这一问题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她认为，以张骞为代表的汉朝使臣，他们所表现出的优秀品质，成为历代中国使臣的楷模。这些优秀品质概括起来说，就是忠于国家，不辱使命，坚贞不移的精神和机智勇敢、从容不迫的作风。作者同时考察了中国历代使臣的出身，指出，他们绝大多数为中层、尤其为下层官员，他们能吃苦耐劳，长途跋涉，又具有实际工作才能，善于应对。所以中国的使臣经常得以完成使命。

这些从另一种角度的观察和诠释，尽管并不一定符合“主位文化”内涵，但却是一种有益的“客位观察”，使我们中国学者走出自我封闭，也换一角度来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同时作者用另一种角度的观察和诠释，也将会使我们中国学者更加接近中亚各国的学者，体会其文化的深层底蕴及其透射出的情感和智慧，有利彼此的沟通和理解，增进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友谊。

四

这部专著我读后也略感缺憾，首先是它所引用汉文史料缺少明清档案（包括台北已公开印行的档案），同时所使用的《明实录》和《清实录》均非佳本，即未使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校印本《明实录》和北京中华书局的影印本《清实录》。其次，作者对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也未给予应有的注意。这些缺憾并非由于作者学力所造成，而是受到了客观条件的制约，我想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日益发展，这些缺憾将会得到弥

补。

另外，这部专著中有个别的汉语专用名词的俄文音译也不正确，如“大宛”，译为“Даванъ”，应为“Даюнъ”。这也不是作者的错误，而是俄罗斯的前辈学者就这样译，但作者应作一注释，予以纠正。再如“蠕蠕”，译为“Жуанъжуанъ”，应为“ЖуЖу”；也属同样情况。

总之，《十四至十九世纪中国在中亚的外交》是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可读性的专著，资料丰富，结构谨严，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明清两朝在中亚的外交。它从另一角度的观察与诠释，必将引起广泛的注意，推进对这一课题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文版前言

本书是在苏联解体前写的，1989 年交给了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出版社。稿件在那里放了七年没人去管它，纸都变黄了。书在 1995 年出版，未经任何改动和加工，这已是在哈萨克斯坦作为主权国家成立之后几年了。

笔者曾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研究了用于本书的资料，主要是木刻板书，还有手稿和清朝时期的书籍。它们是由俄罗斯第一代汉学家比丘林、卡缅斯基、斯卡契科夫等人带回俄罗斯的。第二代学者对我的研究以很大的影响，我忘不了同他们的会面和谈话。他们是：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历史学博士 Л. И. 杜曼，И. Я. 兹拉特金，以及齐赫文斯基院士。第三代俄罗斯学者的学术著作对我成为一名中国在中亚的政策的研究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他们之中，应该举出如下的名字：А. А. 勃克夏宁，В. С. 米亚斯尼科夫，А. С. 马尔丁诺夫。显然，无论对于研究清朝和国民党时期中国历史的人，还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人来说，如果不去关注俄罗斯的汉学研究，就不会有任何一项有意义的成果。但是，写书的年代还在刮着“冷战”之风，哈萨克斯坦的学者与中国的史学同行完全没有任何接触。我们大家，中国学者也好，苏联学者也好，都在独行其事；当然，程度有别，但基本情况一样。

在本书出版之后，我有机会在 1995 年、1998 年和 2002 年参加了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的清史研究国际会议。

1997 年末至 1998 年初，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了三个月。2002 年，我在南京对第二历史档案馆进行了非常短暂的访问。

本书的缺点还由于，当它在 1994 年末出版时，我正在兰州商学院任教，因而未能看到清样。当时出版社排稿不是用计算机，而是用打字机，这样造成了书中许多打印和其它错误。非常感谢我的同行和本书的翻译者——兰州大学的杨恕、王尚达教授以及其他人士，他们为本书中文译本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

克拉拉·哈菲佐娃

阿拉木图—兰州，2002 年

前 言

14~16 世纪中央亚细亚的政治地图，确切一些说，是它的一部分，包括中亚、东突厥斯坦、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在内的地区，发生了重大变化。成吉思汗帝国衰落后，这里出现了一系列的、主要是以真伪难辨的所谓成吉思汗后裔执政者为首的封建领地。以莫卧儿（蒙兀儿）国家命名的领土——蒙兀儿斯坦，包括了从额尔齐斯河到锡尔河以及从巴尔喀什湖到巴里坤的土地。这个联合于同一名称之下的国家，政治上是由独立的、从属和半从属于中央行政和政治管辖的领地组成的。这些封建领地，如玛维兰纳赫尔、曼格拉-苏别、别失八里和亦力把里，都很有名。他们彼此间不断发生内讧，使区域版图不断发生变动。这些领地或某些分离的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相对的或完全的独立，成了中国政治家一方面对它们使用共同名称西域，同时把它们按城市名称加以区分的原因，这些城市有撒马尔罕、赫拉特、哈密、吐鲁番和喀什噶尔等等。在 70 年代（应为 14 世纪 70 年代——译者），玛维兰纳赫尔成了占领了广阔领土的帖木儿帝国的政治中心，但对于中国来说，它继续被称为撒马儿罕（撒马尔罕）领地，和它同时并存的有别失八里和亦力把里领地以及完全独立的哈密和吐鲁番地区。15 世纪，帖木儿帝国在其创始人死后，有过两个中心——赫拉特和撒马尔罕，而后就瓦解了。这个时候，厄鲁特人（准噶尔人，或卡尔梅克人）的国家在西域东部开始兴起，并在 17 世纪前夕成为中央亚细亚强大的国家——准噶尔汗

国。

从历史年表看，几乎在帖木儿帝国形成的同时，在中国，由于农民战争和蒙古族的元朝的垮台，汉族的明朝夺取了政权并确立了统治地位。明朝的第一个皇帝是农民出身，他否定了汉族的宋朝对中央亚细亚地区的消极政策。即位后，他向中亚各领地派出了自己的外交使团，努力和他们建立起政治和商贸联系。由于和契丹、女真发生战争而受到牵制的宋朝是没有这种机会的，它仅仅是和当时加入喀拉汗王朝的于阗有着或多或少的定期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联系就成了单方面的，喀拉汗王朝的外交使团来到了宋朝的首都，但宋朝的外交使团，根据近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判断，并没有派到他们的国家。^①宋朝不能保证自己的大使在去喀拉汗朝国都的路上，在经过仇视他们的部落的居住地时的安全。中国的双边陆上联系中断了。

对于新建的明王朝来说，与遥远的西域国家建立稳定的外交关系是必要的，这有助于提高它在国内外的威望。不该忘记的是，中央亚细亚和中亚的统治者曾臣服于被明朝推翻的成吉思汗后裔的政权。明朝是在对它不利的局势下与西北建立联系的。明朝在南方的外交活动特别顺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出身东干人（即回族——译者）的航海家和外交家郑和的海上考察活动。但是对北方的政策在明朝皇帝的对外政治行动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15 世纪初明帝国受到来自帖木儿强国的威胁，而在帖木儿死后，又受到来自蒙古人的威胁。从 1410 年到 1424 年间明朝连续远征蒙古。战争的第一阶段，明朝获胜。但到了 40 年代，以年号正统（原文为 Чжэнцзун，错。——译者）进行统治的中国皇帝受到瓦剌人的攻击而遭到彻底失败，并在 1449 年当了瓦剌汗也先的俘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皇帝被俘的事件，第一次是宋朝皇帝被女真人俘获。

鉴于土木堡（在今河北省）的灾难，明朝政府被迫重新审查了自己的对外政策，重新确定了它对西北的政策。它被迫放弃了在其它方面的外交扩张政策，这种政策调整因为朝鲜人、越南人以及中国南面的民族较之西北民族仿佛更容易领悟接受中国文明而在思想观念上获得了支撑。但在北方和南方的对外政策的行动机制这一原则问题上仍是一致的，区别仅仅在于：在中国战略家看来，北方很难接受或者完全不能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个结论要求在与北方和西北方的关系中推行更强硬的政策并要有长期斗争的打算。

从15世纪50年代到18世纪50年代，中国对中央亚细亚的外交政策一直占主要地位。其连续性是这样的：先是对蒙古、准噶尔，而后是对西方（也就是东突厥斯坦）。清帝国继承了这一政策。

东北满洲人的一个部落占据了中国，从1644年起这里开始了清朝的统治，中央亚细亚的政治地图又经历了重大变更。在这之前，控制了东突厥斯坦部分领土的准噶尔汗国已建立并相当强盛。很快，叶尔羌汗国、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部分领土都处于它的支配之下。1697年礼部在自己的呈文中向康熙皇帝谈到：“噶尔丹曾破回子中之萨马拉罕、布哈尔、哈萨克、布鲁特（吉尔吉斯——克拉拉·哈菲佐娃）、叶尔钦、哈思哈尔、赛拉木、吐鲁番、哈密诸国。其所攻取降服者，一千二百余城，乃习于战斗之国也”。^②（这段引文请参阅《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83，是康熙皇帝对礼部呈文的批示，而非礼部呈文中语句。——译者）。

为了调节和中央亚细亚国家的关系使尽一切办法和手段，巧妙地获得盟友，利用当时形成的局势给自己带来利益，善于在国际舞台上使自己的对手保持中立或使之孤立，这些方面都表明了清朝外交的特点。在和西欧国家发生碰撞以前，对事物的现实观

点和多少世纪以来遵循的行为规范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军事实力为核心的政策，促成了清政府在中央亚细亚进行的大规模行动取得成功。“它非常不安地注视着准噶尔汗国的日益强大，为获得在西部边陲地区的影响，消灭敌对的和威胁自己的准噶尔势力，并使这个国家的居民归顺自己的统治，动用了政治、军事和财政的所有手段。但其用于完成这件事的武力和财政手段没有获得政治手段那样的成功”。^③

武力只适用于那种情况，即当盟国处于敌对阵营和直接毗邻的时候。这种援助，哪怕是象征性的，清朝也会从需要的角度提供宣传。军事远征之前常进行大量的外交活动。运用基于传统外交制度的各种方法可以达到寻找盟友，然后在所需计划中利用盟友的目的。

当然，准噶尔汗国毁灭的原因首先是汗王的纷争和其它一些内讧。无论何时清朝人都能把有势力的卫拉特人及他们的队伍招引到自己一边来，比如 1775 年时的阿睦尔撒纳，然后是白山派和卓。但是和他们结盟的时间很短——一年左右，有时则是两三个月，而被招引来的盟友的主动效力也只是持续两三年。收集有关游牧民族统治者的材料，认真地进行分析，然后抓住对中国有利的适宜时机加以利用。

除了中央亚细亚诸汗国、西藏、准噶尔、东突厥斯坦外，完成了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俄罗斯帝国，然后是欧洲各国，都成为清帝国的政治伙伴。在这以前，中国外交官在撒马尔罕帖木儿的宫廷里和俄罗斯、法兰西、意大利的外交官会过面，后者充分地亲身感觉到了中国传统外交的独特性，有很多官方文件能证明这一点。

西欧外交可以了解中国外交的诸多方面：它的传统制度、它进行对外联系的办法和处理文件的方法等。只是在亲身体验到中